

陈漱渝／著

沙滩上的 足迹

通过该书，读者可以从一个小人物的经历中看到一个大时代的投影；对于其他学人而言，又能多少从中获取中国当代学术转型期的一些历史资料——特别是当代鲁迅研究史的第一手资料。



东方学人自述丛书

中国出版

东方学人自述丛书

陈漱渝 / 著

沙滩上的足迹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滩上的足迹 / 陈漱渝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1. 1

(东方学人自述丛书)

ISBN 978-7-5473-0277-4

I. ①沙… II. ①陈… III. ①陈漱渝-回忆录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8756 号

沙滩上的足迹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1020 毫米 1/16

字 数: 273 千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277-4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941~1945) / 1

第一节 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声中,我呱呱坠地 / 1

第二节 钟灵毓秀凤凰城 / 2

第三节 外公王时泽与辛亥革命 / 7

第四节 命途多舛的母亲 / 13

第二章 求学生涯(1945~1962) / 24

第一节 从三一小学到会春一小 / 24

第二节 雅礼中学的“丑小鸭” 27

第三节 南开回忆三章 / 34

第三章 粉笔春秋十四载(1962~1976) / 49

第一节 走出寒夜,当了中学老师 / 49

第二节 王震夫人王季青 / 54

第三节 梦魇般的“文革”岁月 / 58

第四节 《南开大学学报》——我鲁迅研究的发祥地 / 64

第四章 吃了三十二年“鲁迅饭”(1976~2008) / 69

第一节 我调到了鲁迅研究室 / 69

第二节 鲁迅研究室老主任李何林 / 71

第三节 鲁迅研究室的顾问们 / 78

- 第四节 我所了解的《鲁迅研究资料》 / 90
- 第五节 我与《鲁迅研究月刊》 / 93
- 第六节 我的短文上了“新闻联播” / 105
- 第七节 我编的书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 110
- 第八节 一个艰苦浩大的文化工程——我与《鲁迅全集》 / 112
- 第九节 怀胎三十多年的《鲁迅大辞典》 / 143
- 第十节 风波迭起的中国鲁迅研究会 / 149
- 第十一节 “予岂好辩哉？”——我学术上的是非恩怨 / 160

第五章 作协花絮 / 187

- 第一节 我参加作协的三位介绍人 / 187
- 第二节 从贝尔格莱德到黑山 / 195
- 第三节 塞纳河的记忆 / 203

第六章 走一走,看一看 / 211

- 第一节 “寻找面包,得到蛋糕”——我的六次台湾之行 / 211
- 第二节 六赴扶桑结文缘——我的日本印象 / 223
- 第三节 我当了一天“倒爷”——我的苏联一日印象 / 242
- 第四节 一次夭折的国际学术交流——我的韩国印象 / 245
- 第五节 美国访学杂记——我的美国印象 / 249
- 第六节 狮城访史探幽——我的新加坡印象 / 264

第七章 “位卑未敢忘忧国”——我的十年政协生涯 / 269

第八章 退休,人生掀开新一页 / 290

- 第一节 告别鲁迅博物馆 / 290
- 第二节 家,避风的港湾 / 295
- 第三节 学术上的新开拓 / 298

后记 / 304

附录 陈漱渝编著书目 / 308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941 ~ 1945)

第一节 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声中， 我呱呱坠地

重庆歌乐山，松柏苍翠，林壑幽美。山中常年多雾，云烟弥漫，有如“半山烟云半山松”的太虚幻境。民国三十年农历闰六月初二，即公元1941年7月25日，我在歌乐山中央产院呱呱坠地。

那是一个“山河破碎风飘絮”的时代，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在中华锦绣大地上肆意践踏。重庆作为战时的“陪都”，虽然豢养了一批发国难财的血吸虫，在这苟安的一隅过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醉生梦死的生活，但从全国各地颠沛流离逃难到此的人们，以及当地的普通市民，则过着缺衣少食、朝不保夕的生活。比吃糙米掺杂粮更为痛苦的是雾季过后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当时的重庆有43万人，但防空洞只能容纳30万人，无辜市民被炸弹炸得血肉横飞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翻阅旧报，我出生当年的5月2日，5月3日，5月9日，5月10日，5月16日，6月2日，6月30日，7月5日，7月7日，7月8日，7月10日，7月18日，7月28日，7月30日，8月9日，8月10日……都有日本飞机进行“疲劳轰炸”的历史记载。日军少则出动20多架轰炸机，多则出动130多架轰炸机，轮番投掷100枚至300余枚炸弹。就连防空设施最好的曾家岩蒋介石官邸也被日机三次投弹。最为悲惨的是6月5日发

生的校场口隧道惨案。这个隧道只能容纳4300余人,但当天日机连续轰炸5小时,涌进隧道的逃难市民多达6500余人,一时秩序混乱,妇孺啼号,互相践踏,致992人死亡,151人受伤。

我出生前,母亲王希孟挺着大肚子躲防空洞;我出生后,母亲带着骨瘦如柴的我躲防空洞。父亲陈维彦当时在四川合川工作,又另有新欢,从来没有出现在母亲身边。孤苦无依的母亲一度带着我寄居在重庆的二伯父陈德斋家。二伯父当时春风得意,但对我们母子却冷若冰霜。他当时有两个儿子,老大叫陈子万,虽年幼但有同情心,常偷偷拿一点可口的食物给母亲吃。母亲原是大家闺秀,无法忍受这种精神和躯体的双重折磨,只好挤上破旧的长途汽车,一路颠簸,投奔在湖南凤凰县避难的外祖父王时泽。见到外祖父时,我刚满两个月。直到四十八年之后,我才在台湾见到那个对于我们母子从来没负过任何责任却使我们长期受到牵连的父亲。

外祖父见到我们母子很是高兴,给我取了一个名字:漱渝。我五行缺水,所以从水字偏旁选择名字。“渝”是我出生地重庆的别称。“漱”出自曹操的《秋胡行》:“名山历观,遨游北极,枕石漱流饮泉。”后来,“枕石漱流”成了形容隐士清高的成语。看来,外祖父当年是想我在这污浊的尘世多留几分清白。我的外祖父、祖父的祖籍都是湖南长沙,所以我一直以身为湖南人自豪。

外祖父给我取的名字虽然高雅,但日后也给我带来了一些困扰。“渝”字经常被人写成“瑜”,“漱”字经常被人写成“濑”。“漱”字还有一个异体字:“漱”。我成为码字的作家之后,经常收到几十元至几百元的稿费单,名字稍有出入就无法取款,只好退回原地,或托人情走后门疏通,令人烦躁。剧作家田汉的前妻叫易漱瑜,所以有些略知中国现代文学的人见到我的名字会说:“我知道,她是田汉的老婆。”让我哭笑不得。

第二节 钟灵毓秀凤凰城

湖南西部边陲,有一片总面积1751平方公里的神秘土地。这里

古称“五溪蛮地”，聚居着苗、土家、满、回、侗、壮等12个民族。苗族又分生苗和熟苗。“熟苗”已与汉族打成一片，而“生苗”则跟汉人有着很深的隔膜——主要是由于历代官府镇压苗民起义所致。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凤凰的旖旎风光已经闻名中外。这里有星罗棋布的洞壑，犬牙交错的溪流，郁郁葱葱的林木，连绵起伏的山峦。凤凰的民居建筑风格独特——黄泥的墙，乌黑的瓦；特别是江边的吊脚楼，每天晚上都会从这里传出呜咽的笛声和清亮的山歌……由于这里位处云贵高原东侧，武陵山脉尾部，地处偏僻，所以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成为难觅的“世外桃源”。

我们之所以逃难到这里，主要因为凤凰耆宿田星六是我外公的至交，是患难关头可以相助之人。田星六（1874~1958），又名田兴奎，凤凰沱江镇人，光绪十七年（1891）应童试，写有“晚凉卷尽洞庭秋”的佳句，深得学政赏识，故自号“晚秋堂居士”，其诗词集也名为《晚秋堂诗集》、《晚秋堂词》。1904年被选送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短期培训。在日本留学期间，外祖父有一次冒雨出行，途中遇到一位中国青年也顶着瓢泼大雨匆匆赶路，问其故，对方说：“因与朋友有约，不能误时，即使下刀子也要赶到。”外祖父觉得此人诚信仗义，又是同乡，便结拜为兄弟。此人便是田星六。田星六长我外祖父11岁，是大哥，此后在生活中对外祖父亲切关怀，严加管束。外祖父也在政治上对田星六施加影响，介绍他加入同盟会，成为该革命团体的早期会员，决心“忧深厝火积薪前，拊枕闻鸡起着鞭”。同一时期，田星六结交的辛亥革命前驱还有黄兴、秋瑾、程潜等。田星六属土家族，少年时期即“嗜为韵语”，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民主革命意识，因而成为近、现代著名的文化社团——南社的著名诗人。南社创始人柳亚子认为他的诗作有奇气，“纵横恣宕不主故常”，风格与鲍照、谢灵运相近。共和国建立后，田星六被聘为凤凰县人民政府委员，湖南文史馆馆员，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田星六的诗词集中关于我外祖父的作品有多首，敬录其中一首：七绝《秋瑾墓》并注，从中可反映他跟我外祖父的革命经历和深情厚谊：

鹃红血影吊荒碑，一语酸心告且知。

泉下若逢诸侠少，莫谈前事但谈诗。

（自注：秋瑾在日本时，曾与刘道一、王时泽等同组十人会，反抗清廷。秋并拜认王母为干妈。星六留学日本，与王为换帖好友，亦常与秋聚晤，与王同以秋姊呼之。此诗作于军阀纷起之时，故国江山，尽入残照，故结语意近消极，实益沉痛。后王编印秋之诗集，赠请星六为之点定。）

留在我记忆中的凤凰，民风淳朴，景色清幽。无论遇到红白喜事，主人都会雇佣一些“哭婆”，在用竹席隔开的小间里号啕。邻居亲友贺喜或致哀时，主人家用大锅的江米酒和用糯米舂成的糍巴款待。晴日外出嬉戏，溪水清澈见底，空气中弥漫着毛竹和山花的香味，林中传来野莺、画眉和红头白翅鸟的婉转啼鸣……

凤凰有多种戏剧：傩堂戏、阳戏、茶灯戏……有一晚，外祖母带我到庙里看戏，戏台上出现了一群大花脸，把我吓惊了魂，高烧不止。外祖母因我患病慌了神，沿途给我喊魂，呼唤我的魂魄归来。

我在凤凰接受了最早的启蒙教育。1945年初，我刚刚4岁，进入了凤凰沱江镇中心小学。沱江镇因沱江流经此地而得名，是作家沈从文、画家黄永玉和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熊希龄的故乡。我4岁入学绝非聪明早慧，而仅仅是因为母亲和姨妈王楚琴当时都在这所小学任教，让我入学，兼具读书和托儿的双重性质。我不记得在这所小学学过什么知识，只记得有一次上课时尿了裤子，还有一次棉衣上招了虱子。这两次都遭到母亲的体罚，所以至今记忆犹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了《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天凤凰的居民是从收音机中听到这一消息的。因为当地的土著居民从未见过日本兵，所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表现相对平静，远不如南京、重庆、长沙的市民那样欢呼雀跃，乐极而泣。但避难到湘西的外地人反映却相当强烈，他们忙忙碌碌奔走相告，反复传递着这一喜讯，甚至百听不厌。他们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结伴还乡，重整家园。

回忆抗战期间的经历,还不能不提及一件我死里逃生的往事。那是在1943年6月18日长沙失守之前,因为湖南局势一度平静,外祖母王蔼慈曾带我回长沙一趟。这位外祖母幼时老家遭受水灾,被人贩子卖给人家当丫头。她不知道父母姓甚名谁,也不知道自己确切的出生年月,只因个子矮,被戏称为“矮子”,出嫁后登记户口,才取“矮子”的谐音,叫做蔼慈,以示庄重。长沙城沦陷,她带我逃到长沙城东乡,途中碰到日本兵清乡。她急中生智,抱着我躲到一处桥墩下。当时我只有2岁,应该没有记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至今似乎耳边还能听到日军铁蹄从桥上走过发出的“咔咔”声,似乎还响起了日军过桥头后架起机枪向逃难民众扫射的“嗒嗒”声。这究竟是刻骨铭心的记忆,还是回忆和想象的重叠混合,我也说不大清楚。姨妈说,事后外祖母拼命夸我懂事,因为我当时只要啼哭一声,或有其他任何动静,那就会暴露,祖孙都会成为日本兵枪下的冤魂。

1946年初,外祖父一家迁回长沙。我也随之离开沱江镇中心小学,转入长沙北区北正街的三一小学。1994年5月,我到湖南吉首大学讲学,利用这一宝贵机会重返阔别近半个世纪的凤凰,写下了一篇《湘行纪实——凤凰展翅》:

涧草,细花,山泉,岩竹。

石板路,吊脚楼,城隍庙,文昌阁。

“南华叠翠”,“东岭迎晖”,“山寺晨钟”,“溪桥夜月”,“龙潭渔火”,“梵阁回涛”,“奇峰挺秀”,“南径樵歌”。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凤凰——我的第二故乡。

凤凰有美的山,美的水,更有美的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全家九口风尘仆仆逃难到湘西,收留我们一家的就是凤凰的父老乡亲。经田星六先生介绍,我们寄居在位于登瀛街13号的马家,一住就是七八年。房东不仅未收分文房租,而且还百般关照。电影《边城》中翠翠的爷爷拒收坐摆渡人的船费,被商品大潮冲击下的观众视为神话。但这类事在民风淳朴

的凤凰,却是屡见不鲜。

“梦里寻常见,睽离五十春。”我朝思暮想的凤凰——我的第二故乡。

今年5月,利用参加学术活动的机会,我终于乘汽车从吉首回到了凤凰。一入县境,展现在眼前的是葱茏的林木,交错的溪河,特别壮美的是层层梯田:黄的是早稻,绿的是杂粮;水田闪着银光,菜花吐着芬芳,真是如锦如画!汽车驶进县城,只见高楼林立,似乎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原来这是凤凰的新城区,而以前的旧城区基本上保持了原貌。

到沱江镇洞井坎去探访田星六先生的故居,是我此行的首务。通往洞井坎的那条山路已经铭刻在我童年的心版上。外祖父无数次牵着我的手在这条路上攀登。路旁溪水潺潺,野花丛丛。推开“新绿山庄”的门扉,是一个花岗石铺的天井。3间正房的左侧,是田星六先生的书房。他一生留下20余种著述,庋藏古籍也极为丰富。特别是每年冬日,“新绿山庄”梅花一树雪边开,更使人联想起诗人刚直不阿的个性。诗人在《雪日斋中》写道:“一醉谢时客,闭门得清坐。意间检书读,矮炉发红火……热酌温冷句,周旋我与我。庭梅相对笑,故红花数朵。”我此次夏日来访,无法欣赏腊梅怒放的胜景,而“庭梅相对笑”的主人也已入仙境,不禁顿感惆怅。更令我痛心的是,经过“文革”浩劫,田星六先生的藏书已荡然无存,遗稿也失毁甚多。聊可慰藉的是,我此次得见田星六先生的嫡孙田景濂先生。他鬓发全白,已从剧团退休。共忆近半个世纪前的情景,真是恍如隔世!

在凤凰县委有关同志和田景濂先生儿媳、女作家丘陵的陪同下,我还利用半天时间找到了我逃难时寄寓的马家,找到了4岁时考入的沱江镇中心小学,还参观了有着1300多年历史并保存完好的黄丝桥古城。县委负责同志告诉我,由于丛山阻隔,交通不便,凤凰经济相对落后。这个古代的“五溪蛮地”,10余年前还是湖南省有名的贫困县。但近些年来,全县财政收入增长近50倍,

连续4年突破亿元大关。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今后,只要系统开发烟草、畜牧、油料、柑橘、药材5大系列,并且进一步开发旅游资源,凤凰的面貌还会有更大的改变。

凤凰——我的第二故乡,你风光旖旎,人杰地灵。我衷心祝愿你在神州大地上展翅腾飞,扶摇万里,为改革开放的历史谱写新的篇章。

第三节 外公王时泽与辛亥革命

外公对我恩重如山!我从小被父亲遗弃,出生之后一直在外公家长大。1957年,我考上了南开大学中文系。外公兴奋极了。他不顾71岁高龄,亲自送我远行——坐火车从长沙到天津,一直坐着硬座;由于那时武汉长江大桥还没建成,到汉口之后还改乘轮渡过江,转了一次车。1962年夏天我将从大学毕业,外公盼我回乡探亲。为筹措路费,他卖掉了家中唯一一件值钱的东西——书桌。令我痛心的是,那年正月初八他刚刚参加完湖南省省长程潜举行的一次春节宴会,初九早晨就无疾而终,享年76岁。

外公喜爱说话。但在家,他的话却很少有人聆听,原因之一是我辈后人大多年幼无知,他讲的那些事情根本就听不懂,也不感兴趣;二是因为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讲的不少事情都犯忌,搞不好随时都会惹上麻烦。直到60年代初,湖南省文史馆广泛征集文史资料,派了一位叫毛居青的工作人员找他聊天。外公一开口,毛居青就连说:“有史料价值,有史料价值!”劝他马上动笔写下来。毛居青走后,外公得意而幽默地说:“原来我一肚子都是史(屎)呀!”打倒“四人帮”之后我才知道,毛居青之所以能成为我外公的“伯乐”,因为他本人是一位饱学之士。他撰写的《黄兴年谱》就是一部力作,曾受到前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好评。

外公的一生就是一部风云激荡的中国近、现代史。1904年初,18岁的外公作为自费生,由长沙经上海赴日本留学,首先进入弘文学院普

通班中的湖南班。学友中就有杨开慧烈士的父亲杨昌济和著名南社诗人田星六。鲁迅那年4月才从弘文学院结业,所学的是日语及普通速成科,跟我外公可说是擦肩而过。这一年的夏天,嫁给湖南湘乡人士王廷钧的秋瑾也到日本留学,在湖南同乡会的集会上跟我外公结识,彼此以姐弟相待。就在结识秋瑾这一年的秋天,孙中山派冯自由、梁慕光到日本组织秘密团体,取合天、合地、合人之意,名之为三合会,成立地点在横滨南京街一家广东人开设的商店。这次入会者除我外公之外,还有秋瑾、刘复权、刘道一、仇亮、龚宝铨等10人。按照洪门的会规,秋瑾被封为“白扇”,俗称军师。

外公对那次入会的情景记忆犹新,回忆起来手舞足蹈,绘声绘色。他说,入会宣暂时,主持人梁慕光手持一柄钢刀,轮番架在宣誓人的脖子上。主持人问:“你来做什么?”宣誓人答:“我来当兵吃粮。”问:“你忠心不忠心?”答:“忠心。”问:“如果背叛,怎么办?”答:“上山逢虎咬,出外遇强人。”10人一一宣誓完毕,梁慕光跟冯自由一左一右,扯开一条两米多长的横幅,上书“反清复明”四个大字。宣誓人先在横幅下面鱼贯穿行。而后另燃一堆篝火,宣誓人从火上跃过,表示赴汤蹈火,忠于革命。最后杀一只大公鸡,歃血盟誓,算是仪式结束。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于东京。三合会的成员均转入同盟会。前些年,浙江电视台与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合拍电视剧《鲁迅》,片中有光复会发展成员的场面,就参考了外公提供的上述细节。

1905年夏,外公利用暑假回国探亲之机,将43岁的母亲谭莲生也接到日本。在秋瑾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的太外祖母也成了东京赤坂区桧町青山实践女校师范班的自费生。青山实践女校由下田歌子(1854~1936)创办。她是日本的著名女教育家,担任过天皇的老师。学校为中国女留学生设立了师范速成科和工艺速成科,特别科学制为一年,本科学制两年,后来又新设了三年制师范科。教学宗旨是“把清国女子培养成既能胜任教育之责又能担当一家之主的女性”。我的太外祖母从该校结业后,回国担任了长沙一所著名女校——周南女中的教师。据外公说,秋瑾在校时学习刻苦,常读书写作到深夜。秋瑾还撰

文号召国内的姐妹：“束轻便之行装，出幽密之闺房，乘快乐之汽船，吸自由之空气，络绎东渡，预备修业。”（秋瑾：《实践女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略章启事》）

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取缔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留日学生奋起反对，实行全体同盟罢课；陈天华投海殉国，以示抗议。秋瑾深受刺激，决定于12月归国。而我外公当时在日本私立海军预备学校海城中学学习，却主张忍辱求学，不必愤激于一时。秋瑾归国后，从上海给外公寄来一信，这就是收入《秋瑾集》中被研究者广为征引的《致王时泽书》。秋瑾在信中表示她自庚子以来，已置生命于不顾，誓死光复旧物，即不获成功而亡亦不反悔。她还坚定表示：“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荃、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落款是“兄竟雄顿首”。她给外公的信都是这样具名，惜历经战乱，大多散佚。秋瑾返湖南湘潭探视子女路过长沙时，都在外公家落脚，地址为长沙通泰街忠信园。秋瑾就义后，亲友之间对于其安葬地点意见分歧。外公开导其家属，确定将秋女烈士忠骨葬于西湖而不迁回湖南。而后外公在长沙筹建了“秋女烈士祠”，并将他保存的烈士诗文稿编为《秋女烈士遗稿》，以“长沙秋瑾烈士纪念委员会”名义出版。外公还撰写了《秋女烈士瑾传》，置于卷首。外公去世前数年，将此书及他保存的烈士遗照全部捐赠湖南省博物馆。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发生。当时外公在日本横须贺海军炮术学校就读，正处于毕业前夕。他在报上读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顿时热血沸腾，不待毕业考试完毕即搭乘法国商船归国，于11月2日抵达上海，跟当地革命军司令李燮和取得联系，被委派办理海军事务。当时停泊在上海的清海军军舰共7艘，仍悬挂龙旗，尚无易帜表示。外公即在海边部署旧炮数门，以壮军威；又率巡防营一队，亲自指挥。经过外公的软硬兼施，首先说服“湖鹏”号鱼雷艇的官兵反正。在“湖鹏”号的带动下，经过一番接洽，其余各舰——被迫卸下龙旗，表示拥护革命。

不久,陈其美接任沪军都督府都督,任命外公担任海军课副课长。外公将收编和新增的官兵 200 余人组成海军陆战队,亲任指挥官,开赴前线助战。

海军陆战队的第一个攻战目标是南京。当时驻守这座古城的是辫帅张勋。正当外公率其部下准备组织敢死队配合各路友军强行攻城时,张勋于 12 月 2 日凌晨率兵经下关逃往江北,南京即日光复。外公被任命为江浙联军参谋兼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外公作战心切,遂被借调到汤芑铭任司令的北伐舰队,仍任参谋,原职保留。北伐舰队开赴烟台,拟会同友军攻占济南。外公准备将扩充后的海军陆战队 400 人调来增援,但适值南北议和成功,清室退位,已无仗可打。外公遂辞去本兼各职回乡葬母。

1913 年夏,袁世凯发动内战,国民党兴兵讨袁,被称为“二次革命”。当时湖南都督谭延闿宣布湖南独立。外公受汤芑铭委派跟谭延闿进行接触,调停成功。湖南方面对曹锟入湘坚决抵制,但对汤芑铭则表示可以接受,于是汤遂一身兼任湖南都督、民政长兼查办使三个要职。汤上任后,日渐逢迎投靠袁世凯,大肆屠戮湘民,遂跟外公分道扬镳。外公劝汤辞职,未果;外公于是自己辞职,不跟他同流合污。

1922 年,张作霖任命沈鸿烈任东北航警处处长,统辖东北海防、江防、水警、航务、渔业、港务、盐务、造船、商船学校、海军学校等事宜。外公是沈鸿烈留日时期的好友,被沈聘任为东北航务局局长兼东北商船学校校长,上述机构都设在哈尔滨。1931 年至 1933 年,又出任青岛海军学校校长。这所学校属公费就读,分设驾驶、轮机、测量等课程,先后培养了航海生 200 余人,轮机生 100 余人,多种水兵 1 000 余人,其中有人成为新中国海军的骨干,也有人成了台湾的“海军总司令”和“总统府秘书长”。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沈鸿烈被任命为青岛市市长,先后六载。我去年到青岛讲学,跟一些青岛的老年市民交谈,他们对沈的政绩(如整顿市容,发展旅游,兴建码头,延长栈桥,举办华北运动会等)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口碑甚佳。青岛市政协还编辑出版了一本《沈鸿烈生

平轶事》。沈接任市长之后,先任命外公以东北海军驻南京办公处处长的名义跟南京方面接洽,后任命外公担任青岛公安局局长(当年的办公楼至今犹存)。

外公在青岛时期的活动我只记得两点。一是外公说,他被派赴南京时,有一次蒋介石约见,但到了时间蒋却未露面,据说是还在里屋打牌。外公在接待厅等得不耐烦,无意中大声打了一个喷嚏。蒋介石吓了一跳,这才想起与人有约,只好离开了牌桌。另一件事是他引进了德国的警犬协助破案。这在中国的公安史上是“破题儿第一遭”。我记得前些年电视节目上还作过介绍。1936年11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举行反日大罢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立即响应。日方提出抗议,要求青岛公安局进行镇压。外公同情偏袒工人,在日方看来当然是镇压不力。同年12月3日拂晓,日海军陆战队千余人武装登陆,逮捕中国工人,并包围捣毁有排日嫌疑的青岛党政机构。外公是日方的迫害对象之一,于是夤夜潜逃,随后被沈鸿烈免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外公退出政坛,避居湖南湘西的边城凤凰。抗战胜利之后又曾复出担任东北航务局局长,直到解放前夕卸职。解放后被聘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礼遇。

在略介外公生平的时候,还有必要补充一段跟文坛有关的轶事:1935年8月,上海容光书局出版了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该书描写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在磐石一带跟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故事,以新的人物、新的场景、新的题材震撼了中国文坛。鲁迅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人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蝥蛄,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问题在于,萧军并没有经历过抗日部队的生活,他如何能写成这样一部如史展现战争残酷性和艰苦性的作品呢?原来,为萧军提供这部作品素材的正是我外公的学生傅天飞。

我外公担任东北商船学校(即青岛海军学校分校)校长时,聘请了

一位叫冯仲云的数学老师。我外公知道冯老师是一位爱国者，中共地下党员，一直对他采取了保护的态度。在冯老师的影响和培养下，学生中又发展了一些中共党员，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抗日部队骨干的傅天飞和后来成为第三国际情报员的著名作家舒群。当时国民党政权在哈尔滨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傅天飞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外公闻讯后，即把傅天飞叫来，开门见山对他说：“你处境危险，如果你是中共地下党员就赶快逃走，如果不是你就坦然留下。”傅天飞腼腆地说：“我没有盘缠。”外公便送给他一笔路费，帮助他虎口脱险。后来傅天飞追随杨靖宇将军参加了满洲省委组织的磐石游击队，1933年春夏之间的一天，傅天飞来到舒群暂住的哈尔滨商报馆，提供了一部他的“腹稿”——关于磐石游击队的史诗。傅天飞虽然热爱文学，但在纷飞的战火中他已无暇创作，便生动逼真地跟舒群讲了一天又一夜。他说，这样一讲就有了两份“腹稿”，将来两人中有一人牺牲，幸存的那一个仍然能将这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写出来。但舒群建议傅天飞将这部“腹稿”重新向萧军讲述一次。舒群说：“以后，萧军写了《八月的乡村》。萧红所写的《革命军在磐石》，亦是沾其余光的。”当然，在《八月的乡村》中，萧军也融入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萧军久习军事，家族中也有人当过“胡子”和抗日义勇军，因而能够娴熟驾驭军旅场面和战争题材。但是，傅天飞提供的素材对创作《八月的乡村》是至关重要的，从特定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没有傅天飞，也就没有《八月的乡村》的诞生。傅天飞后来牺牲的情况我不知其详。但20世纪50年代，哈尔滨筹建东北烈士纪念馆，曾专门派人来长沙找我外公提供史料。冯仲云老师解放后曾出任水利部副部长，“文革”中被迫害身亡。舒群从事地下工作时一度被捕；外公利用职权到监狱给他送衣物，并进行营救。1980年8月，我带着外公的照片拜访舒群，促发舒群的激情。他夜不能寐，写出了一篇长长的回忆录：《早年的影——忆天飞，念抗联烈士》，其中特意提到了外公和我的这次来访。

外公去世之后，我母亲王希孟写了一首悼诗——她不是诗人，尤不懂旧体诗词的格律，只是悼亡抒怀而已。诗云：